

冷戰結束後「歐洲嚇阻」概念的 發展與演進

陳世民*

摘要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國部署在歐洲的中程核武的逐漸撤離，以及歐洲統合的快速進展等背景下，英、法的核武合作再起，「歐洲嚇阻」概念倡議亦隨而出現。

然而此一概念在九〇年代末期逐漸出現困境，法國所提出的「協商嚇阻」做為「歐洲嚇阻」之初始方案的倡議，不論是對另一歐洲核武國---英國，或是對其他現今國內或多或少存在著反核氣氛的歐盟國家而言，十分明顯的均不具有同樣的內含及意義。就短期而言，介於英、法兩個歐洲核武國之間的雙邊協商，似乎仍是唯一能夠持續此議題的辯論及促成「歐洲嚇阻」之實現的可能方向。在未來此一問題相當程度上仍決定於日後歐洲統合的走向與發展，以及北約組織的改造方向。

關鍵詞：歐洲嚇阻、英國、法國、核武、歐洲聯盟、歐洲統合

壹、前言

二〇〇三年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問題上，引起了美國與法、德為首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嚴重分歧，此一分歧所導致的美、歐裂痕，會對日後美歐關係及北約安全機制造成如何的衝擊呢？是否會影響到美國繼續在歐洲安全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意願？而此一可能影響是否會增強歐盟國家建構一歐洲自主防衛力量的期盼，以減少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呢？這可說均是目前備受關注的議題¹。基於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上，美國核保護傘所提供的「延伸嚇阻」(extended deterrence)仍是一重要因素，歐盟國家若欲建構一真正自主的歐洲防衛能力，則是否應發展一「歐洲嚇阻」力量，實為不容忽視的問題。

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此一共同威脅的消失及統一德國的出現，歐共體各國以歐洲統合的加速，來因應此一快速變遷的局勢。在 1991 年 12 月馬斯垂克條約達成協議後所象徵的經濟、文化統合的重大進展下，歐洲聯盟之能否繼續深化統合，

¹ 二〇〇三年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問題上，歐盟內部明顯地有所分歧，法、德、比利時和盧森堡公開反對，甚至在四月份戰爭仍進行之時，計劃在布魯塞爾建立一總部，以牽制美國對北約軍隊的指揮運用。此計劃後來雖被取消，但亦顯示出一些歐盟國家對美國的態度已有明顯改變。另一方面，美國對這些歐盟盟邦的反對立場亦十分不滿，美國國防部長甚至提出「新、舊歐洲」的說法。有關第二次波灣戰爭對美歐安全關係的影響，參見：Lindstrom, Gnesotto, Hoffmann, Missiroli, et al. (2003); Coker (2003); Peterson & Pollack (2003).

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政治統合之問題能否獲致解決，尤其是做為主權之最高象徵的國防力量的整合，及外交、安全政策的協調一致。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於一九九一年決定撤回其在歐陸的所有地基及海基戰術核武，英、法的核武力量首次超過美國在歐陸部署的核武力量。做爲歐盟會員國中唯有的兩個核武國，在冷戰時期便已存在的英、法二國的核武合作，亦再次成爲一歐洲政治統合上備受關注的課題。尤其在馬約簽訂後一個月，法國總統密特朗於一九九二年一月提出「歐洲的核嚇阻準則」之想法，有關「歐洲嚇阻」問題的探討，便一直是近十年來歐洲之官方及學界在研究歐洲安全與歐盟政治統合之深化問題時，備受爭論的一課題。此一合作可否成功整合出一支「歐洲嚇阻」力量，並取代昔日美國的核武在歐洲的嚇阻角色，及形成歐洲自主防衛力量，以促使歐盟擁有一更爲獨立自主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這實爲歐洲統合的探討上所不應忽略的一問題，尤其在目前由於二〇〇三年波灣戰爭所顯露出的美歐裂痕，有可能會導致歐洲自主防衛意識爲之提昇之際。目前國內對歐洲統合之研究日益蓬勃，然而「歐洲嚇阻」問題似乎在學界尚未獲致一充分的關注與研究²。本文之目的即希望能

² 國內對於歐洲政治統合的研究，似乎較集中於「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運作困境，如：沈玄池（1998，2000）張亞中（1998）張惠玲（2000）吳萬寶（2003）陳勁（2002）。

彌補此一欠缺，對冷戰結束後有關「歐洲嚇阻」概念的討論所衍生之問題及其展望做一分析。

貳、「歐洲嚇阻」概念的出現—冷戰結束初期 歐洲統合快速進展的背景

冷戰時期英、法二國核武合作之可能性，隨著歐洲統合的突破與進展，即不時被提出與多次嘗試，然而幾乎所有之努力均以失敗告終。畢竟在冷戰二極格局下，核武乃法國尋求打破兩超強共治及追求國家獨立自主的重要象徵，法國對其核嚇阻力量的運用與解釋向來強調其由本國自主支配的色彩，乃是法國不可被侵犯的主權領域。因此任何形式的有關將法國核武納入歐洲防禦力量的主張，在冷戰時期均被歷任法國第五共和總統所拒絕（Kohl, 1971；Duval & le Baut, 1992）。至於英國，自一九五八年以後其核武發展即大大受益於美國的科技援助，然而此一科技上對美國的依賴，亦損及英國核武的獨立性，使倫敦無完全之權力來決定自己對第三國的核武科技轉移，亦使其核武不得不附屬於北約之管轄中，然而北約之核武政策向來是由美國所主導³。因此在冷戰時期，英、美核武特殊關係的存在，

³ 關於英國的核武，北約訂有一特殊條款以允許「一旦英國政府認為英國的國家最高利益（Vital Interests）受影響時」，英國的核武可以獨立於北約的控制。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唯有獲得英國政府的同意，北約方能動用英國的核武。雖然英國向來強調這點以彰顯其所謂的「獨立核嚇阻力

與尋求獨立於美國軍事影響力之外以顯現其獨立自主地位的的法國核武政策，此二者的矛盾與衝突可說排除了任何英、法核武合作之成功的可能性⁴。

冷戰結束後不久，有關「歐洲嚇阻」(European Deterrence)的想法又再度受到重視，這主因九〇年代初期歐洲統合之快速進展⁵，而在同時美國核武又大幅撤離歐洲大陸(見附表一)，使得法、英的核武可能首次超過美國部署於歐陸的核武數量，而美國所予其歐洲盟邦的「延伸嚇阻」之實質亦因而變的愈來愈虛幻⁶。另一方面，伴隨著歐洲的進一步統合，有關歐洲防衛意識的建立也日益受到重視，這亦令人重新去思考在歐洲安全中英、法核武所應扮演的角色⁷(見附表二至附表四)。

量」(Independent Nuclear Deterrent Force)，然而自 1958 年英國重獲美國之核科技援助後，英國的核武發展便日益依賴美國。尤其是 1962 年拿梭(Nassau)協定後，英國核武的飛彈部份均向美國購買，只有核彈頭是英國自己製造。而且自 1962 年以後，英國所有的核試爆均在美國內華達州進行，英國並無自己的核試爆場。此一核武發展政策上對美國的依賴，自然損及英國核武的獨立性。有關英、美核武特殊關係及其對日後英、法核武合作所造成的阻礙，請參見：Pagedas (1999), Dillon (1983), Clark (1994)。

⁴ 有關冷戰時期英、法之核武合作及其何以難獲進展，請參見：Boyer (1988: 29-46)；Debouzy (1991)，Smart (1971)。

⁵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九日及十日在歐體高峰會上，就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又名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f European Union)達成協議，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七日簽署此約。

⁶ 有關冷戰結束後北約的戰術核武的實力及角色之演變，請參見 Smith (2002-03: 1~20)

⁷ 有關九〇年代初期冷戰剛結束時，對「歐洲防衛意識」之建立上核武嚇阻之角色的探討，請參見下文之討論：Zadra (1992)與 Bozo(1992:)

表一：美國在歐洲的戰術核武及次戰略(sub-strategic)核武之實力的演變

		年份與 戰術核武及次戰略核武彈頭之數量					
武器 系統名稱	1965	1981	1988	1991	1993	1999	
	Lance 短程飛彈	0	692	692	692	0	0
Pershing-1A 中、短程飛彈	200	293	100	0	0	0	
Nike Hercules 短程空對地飛彈	990	686	100	75	0	0	
B-57 轟炸機 的空對地飛彈	0	192	192	192	0	0	
ADM 核地雷	340	372	0	0	0	0	
Pershing-2 中程飛彈	0	0	234	0	0	0	
GLCM 中程飛彈	0	0	443	0	0	0	
Honest John 短程飛彈	1,900	198	0	0	0	0	
Sergeant 短程飛彈	300	0	0	0	0	0	
飛機載炸彈	1,240	1,729	1,400	1,400	少於 800	150	
203 毫米 大砲	975	938	738	240	0	0	
155 毫米 大砲	0	732	732	732	0	0	
總數	5,905	5,792	4,631	3,331	少於 800	150	

407-421)。

⁸ Source: André Dumoulin, *Concepts et potentiels nucléaires 1999-2000* (Les Rapports du GRIP :98/3, Bruxelles: GRIP, 1998), pp.29.

表二：英國與法國核彈頭數量之演變 1989-2002⁹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英國	300	300	300	300	300	250	300	300	260	260	185	185	200	200
法國	410	505	540	540	525	510	500	450	450	450	450	470	350	350

表三：法國核武實力，二〇〇三年¹⁰

投射載具	潛艇導彈 (SLBM)		Mirage 2000N 轟炸機(空對地) 中程導彈 ASMP)	Super Etendard 轟炸機(以航空母艦為基地)(空對地) 中程導彈 ASMP)	總數
	M4 A/B	M 45			
飛彈數量	16	32	60	24	
部署年份	1985	1996	1988	1978	
射程(公里)	6000	6000	2750	650	
可載彈頭數*	6*150 kt	6*100 kt	1*300kt	1*300kt	
彈頭載荷	(千噸 TNT)				
彈頭型號	TN-70/71	TN-75	TN-81	TN-81	
彈頭存量	96	192	50	10	348

SLBM : 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ASMP : Air-Sol-Moyenne Portée

⁹ Source: Robert S. Norris and William M. Arkin: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 104.

¹⁰ Source: Hans M. Kristensen, "French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Project on Nuclear Technology and Arms Control*,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france.pdf>; accessed 20040314).

表四：英國核武實力，二〇〇三年¹¹

投射載具	飛彈數量	部屬年份	射程 (公里)	可載彈頭數* 彈頭載荷	彈頭 存量
潛艇導彈 (SLBM)	48	1994	>7400	1-3*100 kt	185
D-5					
Trident II					

在馬斯垂克條約達成協議後一個月，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法國總統密特朗的一演說，可說象徵了法國有關歐洲核武合作之政策的一重要轉捩點。在此演說中，密特朗首次提出了「歐洲核嚇阻準則」(Doctrine européenne de dissuasion nucléaire) 是否可能形成的問題：「在十二個歐洲共同體國家中只有二國擁有核武，此二國亦各自擁有自己的核準則。然而是否可能出現一個歐洲準則呢？此一問題將很快變成是有關應如何建構一『歐洲共同防衛』(une défense européenne commune) 的主要問題之一。」¹²然而，在冷戰剛結束且蘇聯剛瓦解，而美國在歐洲安全之角色正備受爭論的當時，此一法國提議仍多被視為是在

¹¹ Source: Hans M. Kristensen, "British nuclear forces, January 2003," *SIPRI Project on Nuclear Technology and Arms Control*, (<http://projects.sipri.se/nuclear/uk.pdf>; accessed 20040314).

¹² *Le Monde* (Paris), January 13, 1992, p.1.

戴高樂主義之精神下，爲了尋求和北約競爭在歐洲的主導角色。因此當時該提議並未得到其英國以外的歐盟夥伴國的太多回應，亦未見太多對此提議的深入辯論。而法國本身當時亦評估：「此一提議之未來成功展望仍尚遙遠。」¹³畢竟誠如密特朗總統在一九九四年之所言：「有關歐洲嚇阻的議題，必須先等到（歐洲的）『共同利益』已先被明白界定之後，方得以進展。然而至今此一『共同利益』仍太模糊。這（歐洲嚇阻的議題）乃是下一世紀的事情。」¹⁴

不過英、法之間有關此議題的討論卻已開始有突破性的發展。這或許是由於德國的統一讓此二國感受到其在歐洲之政治地位的可能式微，因而希望在當時歐洲快速統合的情境下，藉由他們是歐盟唯有的二個核武國的優點，在歐洲防衛意識的建立過程中，鞏固其領導地位。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英、法之間有關兩國的「核武政策與準則的共同委員會」（Anglo-French Joint Commission on Nuclear Policy and Doctrine）正式成立，其目的即在探討兩國之核武合作。事實上，自一九八七年起英、法二國便會共同發展可攜帶核彈頭的空對地長程飛彈。不過由於英

¹³ 法國一九九四年的國防白皮書（第五共和至今的第二本，第一本在一九七二年）曾提到歐洲嚇阻的議題，但認爲：「此一提議之未來成功展望仍尚遙遠。」，參見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1994 : 98。

¹⁴ 密特朗的這段話是他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的電視訪談中所提到的。請參考 *Mitterrand* (1994 : 29)。

國於一九九〇年因經費問題將此一計劃延遲，之後更在 1993 年廢止此計劃，因而使英、法之間的核武合作朝另一方向發展。一方面，二國互換一些彼此核戰略與政策的資訊，一些重要問題均開始進行討論，例如歐洲之核嚇阻概念的未來展望，雙方有關戰術性核武之運用的準則（英國將之命名為「次戰略 (sub-strategic) 核武」，法國則命名之為「前戰略 (pré-stratégique) 核武」¹⁵），以及在歐洲之外地區爆發戰爭時核武所應扮演的角色（如波灣戰爭之例子）。另一方面，兩國亦協調彼此在核裁武談判上的立場，例如戰略性武器裁減談判、反彈道飛彈防禦及核不擴散和全面核禁試等條約¹⁶。此一核武政策上的協調合作在一九九三年已有不少進展，兩國的「核武政策與準則共同委員會」於該年曾發表一份有關英、法核武政策之比較的機密

¹⁵ 指在戰略性核武使用前所動用的核武。戰術核武一般乃指可在「戰場」上使用的小型核武，因此具有在戰場上作戰用的「實戰」(war-fighting) 價值，亦隱含在戰略設想上所準備的戰爭類型中，接受「持久核戰」的可能性。由於法國核武戰略反對戰術性核武所隱含的「實戰」、「戰場」及「持久核戰」等意含，因此拒絕使用「戰術核武」一詞，而改稱為「前戰略核武」。

¹⁶ 兩國曾對核試爆一旦被全面禁止後所可能造成對核武科技之發展的影響，進行共同評估。藉由此一共同評估之管道，法國十分可能有向英國提供其在一九九五年所進行的最後幾次核試爆的資訊。在九十年代初之反核聲浪下，美國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宣布暫停核試爆，由於英國無自己的核試場而須在美國進行核試，這使英國自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後便未再進行核試爆。法國一九九五年之核試爆資訊或許將有助於協助英國改善其核武。有關冷戰結束後，英、法之間核武合作之可能內容，參見：Tertrais (1995 : 7~14); Croft (1996 : 777~780)

文件，雖未公開，但該年十一月英國國防部長 Rifkind, Malcolm 曾指出：該委員會「對於英、法二國有關核嚇阻準則之角色、反飛彈防禦、武器管制及核不擴散問題之立場，進行了一比較」，而根據此一報告，「在核武政策上的一些基本問題，英、法二國並無何差異。」¹⁷此一在核武政策上的相互溝通與協商管道的建立，實有助於二國日後之核武合作的進展，與對「歐洲嚇阻」概念的協商。

參、法國「協商嚇阻」的倡議—做為「歐洲嚇阻」之初始方案

自一九九五年初起，法國接連提出有關建構一「協商嚇阻」(dissuasion concertée) 的建議。一九九五年一月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朱貝 (Alain Juppé) 曾公開提出一問題：「繼建構了一個英、法二國之間的(核武)共同準則 (doctrine commune) 之後，在和我們的主要夥伴國 (主指歐盟中之重要國家) 之間，我們這一代是否仍應害怕去思考和他們至少建立起一種「協商嚇阻」的關係呢？雖然這並非是一種和他們『分享我們的嚇阻力量』

¹⁷ Rifkind (1994 : p.26)在一九九五年九月法國總理朱貝 (Juppé) 亦再次指出此委員會所曾做出的結論：「在過去有關英、法二國之核武準則的一些重大原則所曾做過的一些分析探討，已獲致相當成果。此二國在此些重大原則上的相似性超過一般人所想像的程度。」參見 Juppé(1995: 746)

(*dissuasion partagée*) 的關係。」¹⁸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右派的席哈克當選總統後，此一「協商嚇阻」的概念被更清楚的呈現出來。在法國宣布將重新核試的決定之後三個月，總統大選後升任為總理的朱貝¹⁹，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在一次演講中對此一概念做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主要是在我們和英國及德國之間，(建構)一個和我們的歐洲夥伴國的嚇阻，這對於有關歐洲防衛政策之問題的整體考量上乃是必須的。」對於這個和德國的「嚇阻」，朱貝提到他偏好使用「協商嚇阻」一詞，而非「延伸嚇阻」(*dissuasion élargie*)。他提到：「(協商嚇阻)的主要目的是在尋求顯現在一個攸關大家未來生存的共同問題上，每個平等的夥伴國之間對話溝通的必要性。」(Juppé, 1995 : 746~747)²⁰ 一九九六年六月席哈克總統又再次更清楚的澄清「協商嚇阻」的目的：「它並不意味將單方面的延伸我們的嚇阻，或是給予我們夥伴

¹⁸ Alain Juppé, 1995 : p.250. 有關「協商嚇阻」(*dissuasion concertée*) 此一名詞，一九九二年一月在密特朗總統發表有關「歐洲核嚇阻準則」(*Doctrine européenne de dissuasion nucléaire*) 是否可能形成之問題的演說之後幾個禮拜，當時的國防部長 Jacque Mellick 便會對「歐洲核嚇阻準則」研擬出各種不同方案，在此些方案中則首次使用了「協商嚇阻」一詞。請參見：Colloque IRIS/Le Nouvel Observateur,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no. 6 (été 1992), p.44~52.

¹⁹ 一九九五年五月右派的席哈克當選為總統之前，法國乃屬於左右共治的狀況，總統密特朗屬於左派的社會黨，總理巴拉杜 (Balladur) 屬於中間偏右的政黨。而朱貝在當時右派政府中任外長。右派的席哈克當選為總統後，朱貝升任為總理。

²⁰ 「延伸嚇阻」乃指一核武盟邦 (一般泛指美國) 所予其非核盟邦的核子保護傘之安全承諾。

國一份新的（安全）承諾或約定。它乃是爲了要體現我們和夥伴國之間的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關係與彼此間最高利益的緊密聯結。」（Chirac, 1996: 11）

因此，巴黎所倡議的「協商嚇阻」並不是法國之核保護傘的延伸至其歐盟夥伴國，亦非其核武使用之決策權的分享。自從法國建立起核嚇阻力量以來，向來強調其核武的「聖地化」（Sanctuarisation）概念，亦即一國家一旦擁有核武，其領土將因而成爲「聖地」，而使敵國不敢攻擊此國領土。此一概念的另一重要意義則是「聖地」以外的其他國家領土，亦將難以受到「聖地」國的核武的保護。由於一國核武主要乃在使本國領土「聖地化」，因此不太可能爲了保護其他國家的利益使用其核武，而使自己的「聖地」遭受敵國的報復²¹。依照法國的官方準則，其核嚇阻力量乃在保衛國家領土及國家的「最高利益」（Intérêts vitaux）。然而什麼是法國的「最高利益」，巴黎則向來不願明確界定以保持其「不確定性」（incertitude）²²，亦未對其地理範圍做

²¹ 這正如法國長期以來對美國核保護傘的可信度的質疑一般。誠如法國戴高樂將軍及戰略家所曾經提出的「核子時代聯盟的侷限性」觀點，例如在目前所有國家面對核飛彈均處於易毀的狀態下，我們如何相信美國會以紐約被摧毀的代價，來拯救巴黎呢？法國對於「核子時代聯盟的侷限性」的觀點，請參見：Gallois(1960) 及 Poirier (1977)。

²² 法國「以弱制強」（Dissuasion du faible au fort）的嚇阻戰略向來重視戰略上「不確定性」的作用，藉由維持對「最高利益」之解釋的模糊，以增強其「以弱制強的嚇阻」的可信度。有關遠爲弱小的核武國，如法、英二國，面對如蘇聯那樣遠爲強大的核武國，如何運用「不確定性」，來

明確劃定。法國最多只是一再的強調整個西歐均將受益於法國核武的存在，但是巴黎卻向來拒絕言明其他西歐夥伴國的利益是否是法國的「最高利益」，亦不願就其核武是否將用於保衛歐洲做任何承諾。而長期以來，任何夥伴國希望參與法國核戰略計劃協調的要求，亦均被巴黎拒絕²³。

法國此一純粹基於本國利益考量的核嚇阻概念，相當程度上是對六〇年代剛擁有核武當時之背景的反應。在六〇年代戴高樂總統尋求打破兩極體系，以重獲法國的世界地位與獨立自主，而核武乃是法國獨立自主與世界地位的重要象徵。然而此一核武之獨立性的堅持，亦導致法國在其盟邦國家中處於政治與戰略上的孤立處境²⁴。再者，在事實上，法國所一再宣示的「獨立自主」從未如其言詞的表達上所呈現的程度。畢竟面對蘇聯如此的軍事超強的潛在威脅，法國仍需要美國的保護，純粹國

增強其自殺性嚇阻的可信度，尤其是藉由「最高利益」之解釋的模糊，請參見：Poirier (1996: 137-141, 151-155; 1982: 237-242). Altfeld, 1985: 1-26.

²³ 法國在七〇年代亦曾有過「聖地化之擴大」(Sanctuarisation élargie)的爭議，亦即是否要將法國的嚇阻延伸至德國此一前沿戰線(Dissuasion élargie)，這想法在一九七六年曾由當時的參謀總長 Méry 提出，但後來便被法國官方所明白拒絕。有關「聖地化之擴大」的爭議，請參見：Méry, 1976: 15 及 Klein, 1979: 478.

²⁴ 一九六六年法國退出北約的軍事組織(但仍保留其在政治組織的參與)，當時法國乃唯一的北約會員國同時反對北約的組織架構及「彈性反應」戰略。法國亦多少藉由強調法國領土上不存在美國駐軍，及法國的軍隊不受美國將領的統率，以突顯法國的獨立自主。誠如戴高樂將軍當時的名言：「法國的國防只能是屬於法國人的」。

家意義的法國核武若要嚇阻蘇聯成功，很明顯的在其運作上仍須與美國的「延伸嚇阻」緊密結合。尤其是在危機出現時，法國和美國應該會就彼此核武的使用有所協商，即使法國的核武從未整合於北約的作戰計劃中²⁵。

然而在冷戰結束兩極格局瓦解，歐陸心臟地帶出現一統一的德國，及馬斯垂克條約所象徵的歐洲快速統合下，法國逐漸發現其國家的獨立自主不再能憑藉對兩極格局的抵制來突顯；而法國的世界地位的維護却更須依賴一個能夠由法國所主導的強大而團結的歐洲來支持。在歐洲局勢快速演變下，法國或許必須承認其純粹基於本國利益考量的核嚇阻概念，可能在歐洲已逐漸過時與不適用了。這主因此一核嚇阻概念導致法國在冷戰結束後的歐洲安全架構中的孤立局面，尤其在南斯拉夫的衝突解決中，北約顯示出其乃唯一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歐洲安全機制，法國在北約軍事組織中的缺席，已制約了法國在歐洲安全事務的發言地位。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初期，在國際間出現一股強烈的反核聲浪，包括在其歐盟夥伴國之間，而法國爲了維持其核武嚇阻力量的堅持，尤其是一九九五年的重新核試，可說更加孤立了法國在歐洲安全事務中的地位。

爲了突破此一孤立困境，藉由強調歐洲防衛意識的發展，

²⁵ 有關冷戰時期法國和北約的關係，請參見 Bozo, 1991.

很明顯的是目前法國努力的目標。因而其純粹基於本國利益考量的核嚇阻概念，亦須尋求與「歐洲防衛」有所結合。在冷戰結束後的歐洲安全架構及美歐關係仍持續處於轉型及重新建構中的局勢下，法國很明顯的希望善用其擁有核武的優點來影響此一轉型。然而法國若持續處於既有歐洲安全架構中的孤立局面，則難有機會來發揮此一影響，法國「協商嚇阻」概念的提議，很明顯的是基於上述擔憂。「協商嚇阻」或許是法國在面對當時快速變遷的局勢下，一個尋求突破現狀的方案，然而對於所突破後的狀況（歐洲嚇阻）將會如何，則似乎尚無一定案。法國的此一舉動，似乎主要在於將核武因素整合於歐洲統合中，以避免有關核嚇阻與歐洲防禦之關係的辯論，僅侷限於法國所未參與的北約組織的軍事架構中²⁶，此一「協商嚇阻」很明顯被法國視之為「歐洲嚇阻」的第一步²⁷。

另外，在目前歐洲統合日益深廣下，今日我們很難想像法國的「最高利益」能僅侷限於其領土邊界，對於其昔日純粹基於本國利益考量的核嚇阻力量，法國顯然需要賦予更大一層的歐洲面向。而藉由「協商嚇阻」的提出與運作所顯示出的此一

²⁶ 至目前為止，仍是北約組織獨佔了核嚇阻在歐洲所扮演的角色。歐洲聯盟只能在民用核能或核不擴散的問題上發揮作用。

²⁷ 法國有關「協商嚇阻」和「歐洲嚇阻」之關連的討論，請參見：Dossier, 1996: 79~106; Tertrais, 1995: 165~175; Boyer, 1996: 47~57; Géré, 1996: 77~88; Dumoulin, 1996: 75~94.

「歐洲面向」，在目前歐洲一片反核聲浪下，或許亦將能有助於強化法國核嚇阻力量繼續存在的正當性，並給予法國更大的籌碼來影響目前仍在轉型中的美歐關係。而且短期內歐盟內部有關核嚇阻問題的討論，必然仍是依循政府間主義的原則，因此法國在增強其在歐洲防衛意識的辯論中的影響力的同時，仍然將能夠保持其做爲一核武強權的特殊地位。

此外，「協商嚇阻」的提出或許亦反應法國長期以來所欲建構的「歐洲國」世界強權的心態。法國的歐洲統合政策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藉由形成一團結的歐洲力量的出現，來幫助法國恢復其世界地位。而法國顯然認爲要出現一「歐洲國」世界強權，則其國防力量必須擁有足以自衛的核武嚇阻，以保持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及扮演世界性角色。否則一個仍須依賴美國保護的歐洲國，勢必難以扮演此一世界強權角色。因此法國顯然認爲正在發展的歐洲防衛意識，在日後必然須和核嚇阻力量相結合。

再者，法國「協商嚇阻」的提出，亦考量到核武問題在歐洲的敏感性，以及法國本身能力的有限。很明顯的，只有在「協商」已提昇至一定程度後，方可能再去討論法國核保護傘在歐洲的延伸問題，而在此程度達到之前，弱化美國在歐洲的「延伸嚇阻」對法國不一定有利。畢竟歐盟若欲享有一具有可信度

的核嚇阻力量，仍須依靠美、英、法三國核力量的結合。而且單獨一個法國，或英、法核武的結合，仍難以享有類似美國在北約中的主導地位。尤其是目前在歐陸心臟地帶出現了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美國的延伸嚇阻的繼續存在，或許短期內仍是維持歐洲現狀及防止德國軍事化的一重要因素。因此席哈克總統便明白指出：「它（協商嚇阻）並不意味著將以法國或法、英二國的（安全）保證來取代美國（在歐洲）的（延伸）嚇阻。我們所真正想要促進的，是一種全面性的嚇阻力量的提昇。」²⁸因此，目前法國顯然尚無意去破壞大西洋聯盟或美歐關係，最多只是希望重整聯盟內部的力量均勢，尤其是強化聯盟內的「歐洲支柱」。而一個「歐洲嚇阻」力量的出現，不管是以何種型式，將有助於達成此一目標。然而接下來的問題乃在如何克服法國之歐洲夥伴國之間有關核武問題的歧見，這可說是「歐洲嚇阻」能否成功建立的關鍵。

肆、歐盟夥伴國對「協商嚇阻」的反應

歐盟國家若欲在「協商嚇阻」問題的討論上有所進展，首先應尋求使各國對於核武在歐洲安全上所應扮演的角色獲致共

²⁸ Jacques Chirac, "La politique de défense de la France," p.11.

識。然而此一共識至今似乎尚未獲致，而從歐盟各國對一九九五年法國重新核試的反應，更可看出核武角色問題在歐洲的爭議性²⁹。一九九五年九月法國「協商嚇阻」的提議，剛好是在巴黎宣布將重新核試之後三個月，在當時正由於重新核試而引起的龐大國際反核指責聲浪的背景下，法國提出「協商嚇阻」的確引起不少爭論³⁰。然而亦是由於此一龐大反核聲浪，法國的歐盟夥伴國中，除了英國之外，對於巴黎的此一提議均抱持高度保留的態度。

歐盟中除了中立國反對核武的存在外，其他歐盟國幾乎均擔心「歐洲嚇阻」的建立是否會弱化美歐安全關係。對他們而言，「歐洲嚇阻」力量的產生，必須獲得美國充分的諒解，不過

²⁹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國大會上一次有關譴責法國重新核試之決議案的投票中，十五個歐盟國中只有英國支持法國，德國、西班牙及希臘則棄權，而其他十個法國的歐盟夥伴國則投票支持此一決議案。而更重要的是歐盟國中的一些中立國及北歐國家，他們不只譴責核試而已，同時還反對核武。

³⁰ 當時不少人曾批評認為法國的此一提議的目的，乃在於回應此指責聲浪並尋求轉移焦點。然而在總統大選期間，席哈克便曾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六日提到：「我們已經和英國就核武準則問題上進行了有意義的協調，我們應該隨時準備再開啓和另一些重要的歐洲夥伴國有關此一問題的對話。」另一方面，正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法國自一九九二年以後有關此議題的看法，這似乎令人感到巴黎是真的認為一個歐洲防衛意識（*identité européenne de défense*）的建立應當包含有核武因素。因此若說法國只是基於戰術考量，為了轉移國際指責的焦點而提出「協商嚇阻」的議題，這亦不完全公允。有關法國「協商嚇阻」的提議和法國重新核試所引起的指責之間的關連，請參見下文之討論：Camille Grand, "La diplomatie nucléaire du Président Chira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es*, no. 25 (printemps 1997), p.165.

至今我們尚未見到美國有何針對「協商嚇阻」的官方言論。然而只要歐洲嚇阻力量仍然能夠和北約安全機制緊密聯結與合作，美國應該不至於反對此一歐洲國家之間的核武合作³¹。再者，大多歐盟國可能亦均不願見到歐盟國中的唯一兩個核武國因「歐洲嚇阻」的建立，而形成在歐盟中的領導地位。此外，他們對於未來的「歐洲國」是否須擁有核武方得以成爲世界強權這點，可能亦無太大關切，這多少是受其國內的反核民意的影響³²。

然而，誠如法國官方言論中所一再指出的，「協商嚇阻」之能否成功的關鍵，乃在於德、英二大夥伴國的態度。由於在「協商嚇阻」提出前，英、法核武合作便已有所進展，因此德國的態度便具有決定性影響。尤其是「法、德軸心」向來是歐洲統合之推動的關鍵主導力量，亦因而必然會是日後「歐洲嚇阻」的基礎。而且德國對「協商嚇阻」的參與，亦極可能引起其他歐盟國的加入。此外，法、德二國已在傳統武力方面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且已存在一「國防與安全委員會」(Conseil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的協商機構，此機構本身或許即可提供雙

³¹ 有關美國長期以來對歐洲核武嚇阻力量的看法，請參見：Levine, 1995: 71~85. Brenner, 1998).

³² 有關歐盟中的中、小型會員國對「協商嚇阻」的看法，請參見：Dumoulin, 1996, 41~52. 及 Croft, 1996: 781~784.

方核武協商的絕佳場合³³。

不過不同於英、法二國之將核武視為國家獨立與世界地位的重要象徵，核武在德國可能象徵了完全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在冷戰時期，東、西德邊界由於是東、西方的界線，在西方當時「彈性反應」的戰略下，乃是藉由強調不惜首先使用戰術核武的意志，來嚇阻蘇聯具有傳統武力優勢的突然奇襲。因此西德經常擔心一旦東、西方開戰，自己領土是否會被核戰爭所蹂躪。此一擔憂在八〇年代上半葉的歐陸飛彈危機時，曾明顯的表達出來過。因此在核武問題上德國民意向來有一股強大的反核及和平主義聲浪³⁴。另一方面，核武對德國而言，亦象徵著國家安全上對其他強國的依賴。西德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北約而獲重整軍備之權利時，曾承諾不發展及擁有核武，因此強國(主要是美國)的核保護傘對德國的安全向來重要，而以美國的延伸嚇阻為基礎所代表的大西洋主義(Atlantism)理念，至今仍是德國官方安全政策的主流。因而德國有關核嚇阻問題的態度，長期以來一直受和平主義和大西洋主義的雙重影響而難有共識。

在德國統一後，美國的核保護傘或許是目前多數德國人所

³³ 有關法、德二國在傳統武力方面的合作，請參見：Klein, 1997: 185~199. 與 Haglund, 2002: 63-92.

³⁴ 有關冷戰時期德國對西方核嚇阻戰略的爭辯，請參見：Ramsbotham & Miall, 1991: 83~126.

可以接受的一安全保證。至少相對於法國或英國之核武的安全承諾，美國的延伸嚇阻顯然被德國人認為較為可信及可接受多了³⁵。目前東、西方邊界已不再存在於德國領土，美國現在亦幾乎撤回所有部署於德國領土的核武，這亦使德國的反核人士不須再那麼擔心日後爆發的核戰將首先出現於德國。再者，相較於接受英、法核武的安全保護所可能導致的德國在歐洲政治地位的劣勢，接受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的保護，則顯然較無此擔憂。此外，法國有關戰術性核武的「前戰略」(pré-stratégique)嚇阻概念，在冷戰時期便令德國人感到不安。依照此概念，法國射程僅能達到德國領土的戰術性核武(Pluton 或 Hadès 地對地飛彈)，有可能在未獲德國之充分諮詢的情況下，在德國領土使用³⁶。這亦多少有損法國核武在德國的形象。

上述德國內部有關核武問題的大西洋主義及和平主義傾向，多少解釋了一九九五年法國提出「協商嚇阻」概念時，德國何以有所保留，且並未積極回應³⁷。一開始法、德之間有關於「協商嚇阻」議題，僅有一些官員及國會議員之間的非正式討

³⁵ 對於冷戰結束後，德國對核武角色的辯論，請參見 Harald et al, 1997: 115~122.

³⁶ 一九八六年法國密特朗總統曾宣示：在時間及情況允許的狀況下，法國將在發射那些會落在德國領土上的核飛彈之前，先和德國協商。然而類似像北約「核武戰略研擬小組」(Nuclear Planning Group)的機制，至今尚未存在於德、法之間。有關法、德二國對「前戰略」嚇阻概念的爭議，請參見：Duval, 1989: 13~29; Yost, 1993: 12 及 Ruehl, 1988: 47~55.

論。直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法、德在紐倫堡(Nuremberg)的高峯會上方有所突破。在此會中，兩國發表了一份「法、德安全概念」(Concept franco-allemand de sécurité)宣言，德國亦宣稱「將準備開啓和法國之間的對話(dialogue)，以討論核嚇阻在歐洲防衛架構中應如何運作的問題。」³⁸一九九八年德國社民黨上臺後，在它和法國社會黨的聯合聲明中，亦曾指出：「對於法國的核武如何被包括於歐洲統合過程中，我們應該能夠有，且必須要有一開放的討論。」³⁹「德國並沒有核武，且無意擁有它，亦不想擁有使用他國核武的權力。但是在法、德命運共同體中，不應存有一禁忌領域。爲何不創建一個核武協商機制(Groupe de consultation nucléaire)，以使歐洲人可在這裏討論核武的政治、軍事角色呢？」³⁹這似乎是對法國的「協商嚇阻」頗爲正面的回應，它或許反應了德國長期以來所希望的法國將核武納入歐洲安全機制之中的期盼，畢竟法國核武是西方核武力量中唯一尙未納入此一機制的。基於過去法、德雙方有關法國戰術核武之使用的爭議，提供法國核武和歐洲安全機制間的一制度性聯結，以約束其獨立使用所可能造成對德國安全利益的損害，這

³⁷ 有關德國當時的態度，請參見：Mey & Denison, 1996: pp.169~171.

³⁸ *Disarmament Diplomacy* (London), no. 13 (1997).
<http://www.acronym.org.uk/dd13.htm>

³⁹ *Le Monde* (Paris), 13-14, juillet 1997.

的確是令德國所期待的。

不過上述德國社民黨的看法，至今尚未出現於德國的官方文件中。德國政府對「協商嚇阻」的態度仍十分謹慎，最多只是言語上表達其對於歐洲防衛意識中應含有核武因素的支持，但鮮少付諸於真正的行動。即使在法、德二國既存的「國防與安全委員會」中，亦幾無和法國討論核武問題。很明顯的，德國領導人並不認為此一問題具有急迫性。而且在目前德國安全政策上仍是大西洋主義的主流觀點下，德國或許偏好引導法國重入北約的軍事組織，以使其核武受北約之「核武戰略研擬小組」(Nuclear Planning Group)的制約。即使短期內尚難達成，但德國對「協商嚇阻」的態度顯然和其他歐盟國一樣，希望和法國的核武合作不會傷害到美國核保護傘在歐洲的繼續存在。

伍、「歐洲嚇阻」之發展困境與前景

和上述歐盟國的保留態度相較，英國乃唯一對法國的「協商嚇阻」做出積極回應的國家，因此就短期而言，介於英、法兩個歐洲核武國之間的「雙邊協商」，似乎仍是唯一能夠持續此議題的辯論，及促使「歐洲嚇阻」成功實現的可能方向。一九九五年十月在英、法二國高峰會上，雙方領袖決定將「繼續推動與深化彼此間的核武合作」，並接著共同宣示：「我們無法想

像會有如此之情境，在這情境中我們法國和英國之間，當一國的最高利益（vital interests）受到威脅時，另一國的最高利益會不也受到威脅。」⁴⁰在二國的核武問題上，如此之緊密關係的公開宣示，這可說仍是第一次。畢竟「最高利益」一詞在英、法二國的核武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由於此二國之核武的使用所引起的反報復，可能導致該國之整個摧毀，在兩國有如自殺式之嚇阻戰略下，二國均強調其核武的使用乃爲了保衛該國之「最高利益」。然而對於什麼是該國的「最高利益」，則向來強調其解釋權完全屬於該國之最高決策者。對法國而言，此一宣言可說是第一次其決策者願意接受對於該國之「最高利益」的解釋權的分享。這或許可被延伸解釋爲法國的「最高利益」將並不一定是僅侷限於法國本土。值得一提的是，在密特朗任總統時期，密特朗向來拒絕跨過這一步，亦即將法國核武戰略所防衛的「最高利益」延伸至法國本土之外⁴¹。

然而，至今有關英、法核武之「歐洲化」的討論仍處於初始階段，對於「歐洲嚇阻」的概念仍尚未明確化。席哈克總統在一九九六年六月就曾指出：「基於各種不同的有關歐洲的既存

⁴⁰ “Déclaration sur la coopération nucléaire à l’occasion du 18ème Sommet’s franco-britannique,” 1995 october 30 in London. in: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Textes et Documents* (sep.-oct. 1995), p. 263.

⁴¹ 對於密特朗時期有關此一議題的看法及爭論，請參見：Boniface, 1997: 84 & 202.

核武之問題的敏感性，我們並不提出一個已經明確的概念，而是僅提出一個可以再做討論的想法給我們的歐盟夥伴國。」

(Chirac, 1996: 11) 的確，不論是對另一歐洲核武國（英國），或是對其他現今國內或多或少存在著反核氣氛（不論是軍用或民用）的歐盟國家，法國所提出的「協商嚇阻」對他們而言，顯然均不具有同樣的意義。

另一方面，目前既有存在於英、法之間的核武協商關係，亦仍尚有不少發展上的瓶頸。這主要是由於英、美核武特殊關係的存在，及法國仍拒絕加入北約的「核武戰略研擬小組」，以致即使是此一雙邊協商也有其困難處。直到目前，英國的核武潛艇（其現今唯一核武）仍接受北約的統籌指揮，英國亦持續是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核武戰略的支持者，例如被法國所拒絕接受的「最後憑藉」（last resort）的核戰略概念⁴²。

⁴² 冷戰剛結束時，一九九〇年在倫敦高峰會議上，北約各國領袖會共同發表宣言：「在這正在轉變中的歐洲，同樣一批的我們這些盟邦，將採用一個新的北約戰略，在其中，核武將成爲最後憑藉的武器。」然而就像法國反對「彈性反應」戰略一樣，基於相同的理由，巴黎也拒絕接受將核武做爲「最後憑藉」的概念。此一立場在高峰會議結束後密特朗總統所舉行的記者會上曾明白表達出來，他嚴厲的批評「最後憑藉」的概念，認爲它如同是北約接受一種可能性的發展，亦即「在核武之最後憑藉的使用之前，有可能出現一場長期的傳統戰爭。」此一將在法國所處的歐陸上的長期傳統戰爭顯然是巴黎所極不願發生的。因此法國對「最後憑藉」概念的立場，便將之解釋爲是昔日「彈性反應」戰略的延伸，以及認爲它是美國向來所期盼的升高核門檻的努力，以避免美國本土成爲未來核戰爭的第一前線。有關「最後憑藉」的概念之爭論，請參見：Bozo, 1991:173~174.

此外，在北約戰略中英國的「次戰略性(sub-strategic)核武」的角色乃是在尋求執行一個較有限的核武攻擊 (a more limited nuclear strike)，以便讓侵略者對於英國必將防衛其最高利益到底的意志，給予一個明確而不會被誤判的訊息(unmistakable message)，以促使敵人停止侵略。此一概念隱含著對於「有限持久核戰」及「核戰場」等想法的接受，這明顯的和法國的「前戰略(pré-stratégique)核武」不具有同樣的戰略意含。法國之所以拒絕使用「戰術核武」的名稱，而改稱之為「前戰略核武」，即是基於對「有限持久核戰」及「核戰場」等核武「實戰」(war-fighting)角色的反對。法國「前戰略核武」的角色乃在給予入侵敵人施以「最後警告」(ultime avertissement)，此一警告時間甚短，因此不致讓敵人懷疑法國在「最高利益」受損時的嚇阻意志。此意志照法國的官方準則，乃是強調法國將不會畏懼可能導致其全國摧毀的敵人反報復，在「最高利益」受損時法國必然會立即、全面且自動地使用其所有核武來報復敵人。

再者，就如同冷戰時期一樣，英國仍持續反對任何可能有損北約之運作，或傷害她和美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之任何措施。在一九九五年的英、法高峰會上，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就曾強調，有關兩國的核潛艇之巡航的相互協調能否達成，這一高層次的核武合作，只有在法國加入北約的「核武戰略研擬

小組」之後方有可能。就如他所言：「在北約之外的第二個核武決策機制並無存在的空間」⁴³。同樣的也是基於此一考量，英國對於將德國納入英、法核武協商中的法國提議，亦多持保留態度，因為英國至今仍反對在北約之外成立另一個歐洲多邊核武協商機制。因此十分明顯的，只要法國仍堅持保留其在北約中的特殊地位，其他歐盟國就極可能將任何「歐洲嚇阻」的發展，看成是反對美國在歐洲安全扮演重要角色的傾向。若是如此，則超越英法合作的歐洲多邊核武協商機制的建立，就並非是容易之事。在未來，此一問題相當程度上仍決定於日後歐洲統合的走向與發展，以及北約組織的改造方向。

然而以目前歐洲統合的程度，要來解決英、法核武嚇阻力量的歐洲化問題，似乎仍嫌太早了。在歐盟國之間對核武角色尚無一共識，且歐洲亦乏一共同的戰略文化下，目前在歐洲統合中談核武問題，就有如「蓋房子從屋頂先蓋起一般」（Dumoulin, 2000: 36-37）。現今若勉強要討論歐洲防衛政策中的核武問題，只會加深歐盟會員國之間的歧見，並使「共同外

⁴³ 「和英國首相 John Major 的訪談」, *Le Monde*, 29-30, octobre 1995, p.2. 在當時，法國正在和北約討論重新加入北約的軍事組織的問題，且似乎很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然而，由於美國和法國之間有關南歐地區的軍事指揮權的爭議，此一可能性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北約馬德里高峰會上被法國宣布放棄。當時法國主張應由歐洲人來擔任一直是由美國做的南歐地區的軍事指揮官，美國則拒絕之。

交與安全政策」這十年來的小小進展爲之受阻，而「歐洲嚇阻」亦可能因其在條件不足的情況下的過早提出而見光死。因此，目前有關歐洲防衛力量之建構的努力，主要乃集中於歐盟現今較爲迫切需要的，且亦較容易成功的傳統武力的建立與合作，如「歐洲軍團」(Eurocorps)此一快速反應部隊的建立⁴⁴。

陸、結論

誠如上述之分析，「歐洲嚇阻」若欲成功發展的一重要條件乃在於美歐安全關係的重新建構，只有在歐盟國家意識到「自主防衛力量」之需求的重要性，方會去重視歐洲統合之進展中，是否該去發展一歐洲獨立嚇阻力量的問題，而這可能是由於對美國安全承諾的質疑，或美國保護歐洲之意願的下降。二〇〇

⁴⁴ 一九九九年六月歐盟的科隆高峯會中，各國同意歐盟應發展「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並將危機管理視爲此政策的核心，且決議加強衝突預防功能及擁有自主行動的能力。同年十二月的赫爾辛基高峯會中，更進一步具體化此政策的內涵，決定在理事會內建立常設性的政治及軍事架構，以提供危機中的政治控制和戰略指導。並決定「在二〇〇三年時建立一支可以在六+天內部署，並至少維持一年六萬人的軍隊。」不過原訂在二〇〇三年七月成立的歐盟快速反應部隊，已於二〇〇三年六月的歐盟高峯會上宣布延期至二〇一〇年。有關歐盟「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的發展及爭論，參見：Deighton, 2002: 719-741, Menon, 2002: 32-45, Shepherd, 2003: 39-63, Sangiovanni, 2003/2004: 193-206. 有關「歐洲軍團」(Eurocorps)此一快速反應部隊的建立，參見：Sten Rynning, 2003: 53-72, Haine, 2001, Sosnicka, 2000: 115-128. 與吳萬寶，二〇〇三年。

三年波灣戰爭所顯露出的美歐裂痕，是否會令歐盟國家重新思考，在冷戰結束後蘇聯此一共同威脅已經消失的情況下，美國與歐盟的利益是有可能出現衝突的，則美國的「延伸嚇阻」是否真的比起歐盟國自己所建立的「歐洲嚇阻」力量更為可信呢？尤其是攸關「歐洲嚇阻」之能否建立的關鍵國家：德國，是否將會因此動搖大西洋主義在其安全政策上的主流地位，而強化和法國的核武協商關係呢？上述對「歐洲嚇阻」概念之爭論的分析，或許有助我們思考日後美歐安全關係的可能發展。

「歐洲嚇阻」的討論或許在目前因歐盟各國把注意力放在歐洲傳統武力的合作上而趨於沈寂，不過此一討論仍使我們明瞭，任何歐洲自主防衛力量的建構若缺乏核武此一要素，都將是有所欠缺的。以現今歐洲統合的程度，的確尚難以解決「歐洲嚇阻」問題所引起的爭議，然而就如同歐洲統合在過去所曾遭遇的種種困難，它們原先亦被認為難以克服，但之後卻又得到解決，並使歐洲統合更進一步的推展下去。同樣的，在未來只要歐洲統合繼續深化發展，那歐盟各國政府就無法忽略此一事實：他們會員國中的二國目前是，且打算繼續是核武國家。未來只要統合繼續深化，就不能不去面對此一議題。即使由於此一問題的敏感性而難以在官方間做充分討論，但它卻是學術界所不容忽視的，因為它牽涉到的是歐洲統合的最後目標應該

爲何，畢竟拒絕「歐洲嚇阻」力量的建立，這形同在歐洲統合的最終目標上，拒絕一個「獨立自主的歐洲國」的出現。在未來如何於歐盟各國間建立一對核武角色的更大共識，並形成各會員國間更爲一致與相互連結的「最高利益」，且在彼此負擔的責任與扮演的角色上做更好的分配，這些均是在日後「歐洲嚇阻」的建立上所尚須先行努力的地方。

參考文獻

- 沈玄池 (2000), 「歐洲聯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體制與運作方式改革之研究」, 《美歐季刊》, 14 (3), 頁 263-304。
- (1998),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功效與極限：歐盟之南斯拉夫政策個案研究」, 沈玄池、洪德欽編, 《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 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頁 335-381。
- 吳萬寶 (2003), 《邁向歐盟建軍之路：歐盟共同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 臺北：韋伯出版社。
- 張亞中 (1998), 《歐洲統合：政府間主義與超國家主義的互動》, 臺北：揚智出版社。
- 張惠玲 (2000), 「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 《問題與研究》, 39 (11), 頁 49-70。
- 陳勁 (2002), 《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 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 André Dumoulin (1998), *Concepts et potentiels nucléaires 1999-2000* (Les Rapports du GRIP :98/3, Bruxelles: GRIP).
- Asmus, Ronald D. (2003), "Rebuilding the Atlantic alli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5, 20-31.
- Bortolin, Aurélie (2003), *Risques, menaces, et dissuasion nucléaires française*, (Paris : L'Harmattan)
- Boyer, Yves (1988), "Franco-British nuclear cooperation: the legacy of history finally overcome" in Yves Boyer, Pierre Lellouche & John Roper eds, *Franco-British defence co-operation: A new entente cordiale?* (London: RIIS).
- Boyer, Yves (1996), "Les armes nucléaires et l'Europe," *Défense Nationale*, 47-57.
- Bozo, Frédéric (1991), *La France et l'OTAN : De la guerre froide au nouvel ordre européen* (Paris: Masson IFRI).
- (1992), "Une doctrine nucléaire européenne : pour quoi faire et comment ?"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2, 407-421.
- Brenner, Michael J. (1998), *Terms of engagement :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Chirac, Jacques (1996), "La politique de défense de la Franc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vant les auditeurs de l'IHEDN", le 8 juin 1996 in : *Défense nationale*, 52ème année, 7-17.
- Clark, Ian (1994), *Nuclear Diplomacy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 Britain's Deterrent and America, 1957-1962* (Oxford: Clarendon).
- Coker, Christopher (2003), *Empires in conflict : the growing rift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tehall paper series; 58,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2003).
- Cornish, Paul (2004), "NATO : 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1, 63-74.
- Croft, Stuart (1996), "European integration, nuclear deterrence and Franco-British nuclear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72 :4, 771-787.
- Debouzy, Olivier (1991), *Anglo-French Nuclear Cooperation: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Whitehall Papers, (London: RUSI).
- Deighton, Anne (2002),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4, 719-741.
- Dillon, G. M. (1983), *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 Success and Civility in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Nuclear Relationship 1962-1982* (Aldershot: Gower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 Dossier (1996), "La France,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et l'Europ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no. 21, 79-106.
- Dumoulin, André (1996),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européenne Quel avenir?* Les Dossiers du GRIP n.211-212 (Bruxelles: GRIP).
- Dumoulin, André (1996), *Place, fonction et articulation potentielles des armes nucléaires françaises et britanniques dans la définition de l'identité européenne de défense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Direction générale des études du Parlement européen (Bruxelles : GRIP).
- (2000), "L'Identité européenne de sécurité et de défense et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Défense nationale*, 56e année no. 8-9, 36-37.
- Duval, Marcel & Yves le Baut (1992), *L'arme nucléaire française: pourquoi et comment?* (Paris: S.P.M).
- Duval, Marcel (1989), "L'arme nucléaire tactique, pour quoi faire?" *Défense nationale*, février, 13-29.
- Eden, Douglas ed. (2000),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relationship : issues of identity, security and power*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 Gallois, Pierre M. (1960), *Stratégie de l'âge nucléaire* (Paris: Calmann-Lévy).
- Gegout, Catherine (2002), "The French and British change in position in the CESDP : a security Communit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Politique européenne*. no. 8, 62-87.
- Géré, François (1996), "La dissuasion déconcertée...? ou la

- concertation nucléaire européenne,” in : Baer, Alain et al.: *Demain, l'ombre portée de l'arme nucléaire...: L'arme nucléaire française en question* (Paris: CREST/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Grand, Camille (1997), “La diplomatie nucléaire du Président Chira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no. 25, 157-169.
- Haine, Jean-Yves (2001), *L'Eurocorps et les identités européennes de défense : du gage franco-allemand à la promesse européenne*, (Pais; Centre d'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de la défense).
- Haglund, David G. (2002), “Travels with Charlemagne : metaphor, myth and the puzzle of Franco-German security and defence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 vol. 23, no. 1, 63-92.
- Harald, Müller (1997), “The Germany’s Debate on Nuclear Weapons and Disarma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0, no. 3, 115-122.
- Juppé, Alain (1995), “Discours du Premier ministre prononcé à l'IHEDN du 7 septembre 1995,”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3, 743-751.
- (1995), “Quel horizon pour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 Discours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 à l'occasion du vingtième anniversaire du Centre d'analyse et de prévision.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1, 245-253
- Klein, Jean (1979), “La France, l'arme nucléaire et la défense de l'Europe,”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3, 461-479.
- Klein, Jean (1997),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et identité européenne de défense,” *Stratégique*, vol. 68, no. 4, 185-199.
- Kohl, Wilfrid (1971), *French nuclear diplo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Robert A. (1995), “An American View,” in Witney, Nicholas; Debouzy, Olivier et Levine, Robert A. *Western European Nuclear Force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 Lindstrom, Gustav , Nicole Gnesotto, Stanley Hoffmann, Antonio Missiroli, et al., (2003), *Shift or rift : assessing US-EU relations after Iraq* , (Pari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European Union).
- Menon, Anand (2002), “Playing with fire: the European Union's defence policy,” *Politique européenne*, no. 8, 32-45.
- Méry, Guy (1976), “Une armé pour quoi faire et comment?” *Défense nationale*, juin, 11-34.
- Mey, Holger and Denison, Andrew (1996), “France’s Nuclear Tests and Germany’s Nuclear Interests,” *Comparative Strategy*, no. 15, 169-171.

-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1994), *Livre blanc sur la Défense 1994* (Paris: U. G. E. 10/18).
- Mitterrand, François (1994), "Intervention du président Mitterrand sur le thème de la dissuasion," Paris, 5 mai 1994, in :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Textes et Documents* (mai-juin 1994), 26-33.
- Moravcsik, Andrew (2003), "Striking a new transatlantic bar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4, 74-89.
- Pagedas, Constantine A. (1999),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Relations and the French Problem, 1960-1963 : A Troubled Partnership* (London: Frank Cass & Co).
- Pajon, Christophe (2003), "L'Europe de la défense et la transformation des identités militaires : quelle européanisation ? : le cas des acteurs militaires britannique, allemand, français," *Politique européenne*, no. 10, 148-171.
- Peterson, John and Mark A. Pollack eds. (2003), *Europe, America, Bush :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 Poirier, Lucien (1977), *Des stratégies nucléaires* (Paris: Hachette).
- (1996), "Dissuasion et puissance moyenne," *Revue de Défense Nationale* (mars 1972) in : *Stratégie théorique III* (Paris: Economica).
- (1982), "L'empire des incertitudes" in Poirier, Lucien, "Problématique de la crédibilité dans la stratégie de dissuasion nucléaire," *Essais de stratégie théorique* (Paris: FEDN).
- Ramsbotham, Oliver & Miall, Hugh (1991), *Beyond Deterrence :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New European Security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 Rifkind, Malcolm (1994),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in UK Defence Strategy" Speech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in Novembre, 16, 1993 Centre for Defence Studies: *Brassey's Defence Yearbook 1994* (London: Brassey's).
- Robert S. Norris and William M. Arkin (2001), "French Nuclear Forces, 2001"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7, no. 4, 70-71.
- Robert S. Norris and William M. Arkin (2002),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2,"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58, no. 6, 104.

- Ruehl, Lothar (1988), "Franco-German military cooperation: an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 Alliance," *Strategic Review*, vol. 16, no. 3, 47-55.
- Rynning, Sten (2003) "Why not NATO?: military plan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6, no. 1, 53-72.
- Sangiovanni, Mette Eilstrup (2003/2004), "Why a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s bad for Europe," *Survival*, vol. 45, no. 4, 193-206.
- Shepherd, Alistair J. K. (2003),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1, 39-63.
- Smart, Ian(1971): *Future conditional: the prospect for Anglo-French nuclear cooperation* (London: IISS).
- Smith, Julie (2003), "The future of Europe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9, no. 5, 943-950.
- Smith, Martin A.(2002), "In a box in the corner ? : NATO's theatre nuclear weapons, 1989-99,"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5, no. 1, 1-20.
- Sosnicka, Malgorzata (2000), "Eurocorp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NATO, WEU and EU,"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9, :no. 4, 115-128.
- Tertrais, Bruno (1995), "Quelle dimension européenne pour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no. 18, 165-175.
- (1995), "Le printemps des relations franco-britanniqu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stratégiques*, no.17 , 7-14.
- Wijk, Rob de. (2003/2004), "European military reform for a global partner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 145-210.
- Yost, David (1993), "Europe and Nuclear Deterrence," *Survival*, vol. 35, no. 3 , 97-120.
- Yves Boyer (1988), "Franco-British nuclear cooperation: the legacy of history finally overcome," in Yves Boyer , Pierre Lellouche & John Roper eds, *Franco-British defence co-operation: A new entente cordiale?*, (London: RIIS,), pp.29-46
- Zadra, Roberto (1992),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et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après la guerre froide* (Paris : Institut d'Etudes de Sécurité de l'Union de l'Europe Occidentale, Cahiers de Chaillot: 5,).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European Deterrence” after the Cold War Ends

Shih-min Chen*

Abstract

Anglo-French nuclear cooperation began to emerge in a serious fashi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 renewed debate about a future European deterrent was then launched, even if it remains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However, the future course of Anglo-French debate over nuclear forces is deeply tied to the course of the debate over European construction. During 1995, French officials began a new debate on the European contribution to nuclear deterrence in Europe. This led to the suggestion by French Prime Minister in January 1995 of the concept of “Concerted Deterrence”. This concept would have the UK and France working together with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or Spain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deterrenc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s long as Paris chooses to remain outside the integrated military structure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most particularly outside the Nuclear Planning Group, “Concerted Deterrence” is likely to remain little more than a concept. There are clear limits, both in the Anglo-French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and in EU politics more generally, constr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Europeanized nuclear forc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Keywords: European deterrence, UK, France, Nuclear Weapons,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 historical context, nuclear deterrence began to emerge in a strategic fashi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early 1950s,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 was launched even though it remains extremely controversial.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tegy is still in progres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the European deterrence strategy.